

序章 儿童与小说

幸福的人是那些经历了这样寂静无声的夜晚的人，
幸福的人是那些能回忆起这样夜晚的人。

——[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

第一节 儿童：存在与想像

“儿童”这个词语，既指某个现实的经验儿童，又是一个经过成年人探讨、形成、解释和表达的概念。

经验儿童是一个个个体的存在，他们体态各异、性情各异、命运各异。在日常生活中，成年人常常称之为“孩子”。然而，无论他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境遇如何，人们已对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想像。

在这些想像的过程中，尘俗气、烟火味浓厚的“孩子”称谓被学理性的“儿童”所取代，有血有肉的个体差异逐渐被淡化成社会问题、教育问题或心理（生理）问题中的一个年龄族群。想像，意味着成为成年人的话语对象：《老子》、《庄子》中用“天”、“真”、“纯”、“赤子”这些澄澈的词语来表达对自然无伪的天性的认同。这种天性，当然集中体现在童子身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①明代的李贽则明确地把这种天性称为“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②尽管有地域和形态的差别，“真”却几乎是所有文化对儿童的基本描述；至于与自然的同一和相通，则是成年人最为罗曼蒂克的儿童想像，它甚至构成了西方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内涵，它使得诗人华兹华斯唱出了“儿童是成人之父”的曼妙而又意味深长的丽音。当人文的历程逐渐在人与自然之间划出一条条明显的界限，当文明的饱和日益将山川河流、飞鸟鸣禽置于对抗者的位置时，席勒在《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说：“我们的童年是文明人类中还可遇见的惟一未受摧残的自然形态。”人之初的儿童在精神上满足了无奈又无力的人们返归“混沌”世界的愿望。当人们逐渐陷入理性追求途中的死胡同时，儿童的原初逻辑、儿童的原初思维方式让耽于沉思并苦恼不堪的哲人们体验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就毫不犹豫地于童言妙语中寻找着儿童与非理性精神的贯通，并加以由衷的推崇。对“儿童”的发现又预示着一个以主体性和个性的突现为表征的思想现代性的到来，无论是 19 世纪的欧洲还是 20 世纪的中国，莫不如此。……也许正像意大利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蒙特梭利所说：“儿童曾是连续性和希望的无可争议的象征，是将其他一切价值集于一身的某种价值。”^③

经验儿童丰富了想像的细节和内涵，想像的儿童同样建构着

①（汉）赵岐注、旧题宋孙奭疏：《孟子注疏》，艺文印书馆 1993 年版，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重刊宋版十三经注疏本，卷 13 第 232 页。

② 李贽：《童心说》，见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68 页。

③ [意大利]蒙特梭利：《吸收性心智》，王坚红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 年版，第 127 页。

经验儿童的现实。美国批评家费德勒 (Leslie Fiedler) 曾说：儿童不只是对现实的复制，他是文化的发明，是想像的产物。”^①而法国心理学家达尼勒·拉加西 (Daniel Lagache) 则根本否认儿童的独立存在：“在独立地、为自己、依靠自己存在之前，儿童是为他人、也是通过他人存在的。他处在被期望、被计划以及附属的位置。”^②

这种建构与被建构、塑造与被塑造的过程，凝结着成年人关于自身、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未来的种种想像，始终是成年人乐此不疲的一项事业。作为过来人，成年人往往以儿童世界的洞察者和代言人自居，然而，他们又无法完全摆脱成年人的立场；而儿童在现实世界不具备话语的制造权或者说缺乏自我表达能力，所以儿童对于成人社会，永远具有不可知性。尽管人们本着对自身起源的好奇，曾经对儿童世界进行了执著的探索，发现这个世界与成年世界是相近的，但它也有着自主性，其上笼罩着神秘的气息。法国小说家皮埃尔·鲁提 (Pierre Loti) 就曾这样表达他的困惑：“正是带着一丝畏惧，我提到了生命伊始的印象给我的神秘感。我不能确定我是否真的曾经经历过它，难道它们没有被神秘地转化为记忆吗？围绕这座圣殿，我有某种宗教似的情感。”^③

卢梭也曾说：我们不了解童年。1762年，《爱弥儿》出版。继这本被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斯 (Philippe Aries) 认为带来了一个“儿童崇拜”之世纪的书之后，无数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在儿童研究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儿童生存状况的改观与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了，有

① Leslie Fiedler. *The 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1. p. 471.

② Jacques Lacan. *E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p. 652.

③ Quoted in Reinhard Kuhn. *Corruption in Paradise*. Hanover and London: Brown University, 1982. p. 3.

关儿童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卢梭的叹息却犹在耳畔。我们不得不像英国作家萧伯纳一样，在困惑中承认：面对孩子，我们深深地感到迷茫。^①而当法国小说家阿兰（Alain）也许不无偏颇地断言“所有关于儿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②之时，我们依然只能沉默。

凡此种种，使儿童似乎成为现代术语所说的、永远不可解码的“能指”。他们是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更是精神存在。

—

在以成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关于儿童问题的种种讨论的焦点，不仅在于指出一个区别于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的群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关注儿童和成年人的社会关系，是儿童对成年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1960年，阿利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一书，此书已经成为儿童史研究的经典之作。阿利斯指出，儿童概念只是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以来形成的一个概念，在那以前，人们对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儿童的世纪》一书的主要观点是：西方中世纪，儿童在社会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但是，也有大量的资料表明，阿利斯的看法不无偏颇。比如，另一位法国学者拉杜里（La Roy Ladurie）通过对13世纪末和14世纪早期法国小山村蒙塔尤（Occitanian）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蒙塔尤人和萨巴泰人在灵魂深处对儿童，哪怕是最小的婴儿也怀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发自内心和溢于言表的亲切感。这种感情是当地文化的基础并与之共存。”^③戴维·赫利黑、福赛思、德梅特尔、班克等人的研究也

① George Bernard Shaw. *Collected plays with Their Prefaces*. 2vols. London: Max reinhardt, The Bodley Head, 1972. p. 18.

② Quoted in Reinhard Kuhn, *Corruption in Paradise*. Hanover and London: Brown University, 1982. p. 3.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9页。

为拉杜里的结论提供了相应的支持。^① 在西方，从古代到中世纪结束，人们对儿童的兴趣是实实在在的，更不必说中世纪以后了。遗憾的是，在中国，还没有见到对 20 世纪以前中国儿童的系统的、专门的研究；至于“五四”儿童解放思潮中，新型知识分子们对戕害儿童的圣贤之书的批判，有着特定的时代目的，并不足以证明儿童真实的生活状况。实际上，19 与 20 世纪之交，两位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丰富多彩，并不像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宣称的那样毫无生趣。在《孩提时代》一书中，这两位外国传教士详细记载了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中国儿童生活，虽然这些孩子的穿着的确与大人无异，但他们的生活、特别是游戏生活，即使是今天的孩子也不能望其项背。^② 无独有偶，20 世纪末，一位现代人从人物自传散文中，挖掘出了大量关于 20 世纪童年生活的纪录，写成《另一种童年的告别》一书，在该书的“游戏和工作篇”中记载的儿童生活也是丰富多彩，令人羡慕。^③ 其实，人们对孩子既然寄予了未来的期望，无论是出于个人前程还是家族荣耀的考虑，孩子就不能不成为家庭生活的重心。

因此，尽管强调历史上的儿童有着不幸的童年是主流观点，儿童，却多多少少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中心。

二

与历史学家们试图揭示儿童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的出发点不同，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们一直试图弄清楚儿童究竟是什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中国正酝酿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时，西方在如何看待儿童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立场：

参见俞金尧：《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

② [美] 泰勒·何德兰[英] 坎贝尔·布朗士：《孩提时代——两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群言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所谓“白板说”。这种观点认为，儿童是尚未成形的人，经由识字、教育、理性、自制和羞耻心的培养，得以成为文明的成人。这也是西方基督教新教的理念。二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观点：未成形的儿童倒还好，而畸形变形的成人，才是问题的关键。儿童天生具有体谅、好奇心和自动自发的能力，但是，这些天生能力却被识字、教育、理性、自制和羞耻心的培育所损害。^①通过译介，这两种理念对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实际上，中国人对于作为一个特殊年龄团体的儿童的认知，就是 20 世纪初随着对西方社会及其近代的社会知识的了解开始的。当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人用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打量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以西方社会为参照来反观中国社会，并进而开展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社会革命运动。由梁启超对少年生命力的礼赞到新青年对传统礼教的批判，虽都是以拯救中华民族为至上的目标，却正是以“救救孩子”为原动力的。在《新青年》《青年评论》创刊号的卷首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开宗明义说道：“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词也；此亦东西方民族设想不同现象趋异一端欤？”鲁迅也曾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②在这些反对将儿童看成是“小大人”的旧观念的指责声中，明显包含着对浪漫主义的儿童观的借鉴。

之后整个 20 世纪，随着现代教育、现代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儿童观”又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弗洛伊德和现代教育学家杜威。两人于 1899 年同一年，分别出版了对 20 世纪人类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梦的解

① [美] 尼尔·波茨曼 (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 萧昭君译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 1994 年版,第 68 页。

② 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6 页。

析》和《学校与社会》。弗洛伊德的观点广为人所知，他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儿童内心存在一个极佳的结构和一种特别的内涵。例如，儿童拥有性能力，充满本能的心理趋力。为了达到成熟的成人境界，儿童必须克服本能的激情，将之升华。而杜威则从哲学的角度，主张儿童的心理需求应当从儿童现在是什么来考量，而不是从儿童的未来考量。^① 这两位学者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儿童既不是洛克所说的“白板”一块，也不能像卢梭那样，过于强调文明对儿童的副作用。儿童有其特殊的天性，但也需要合适的教导，才能成熟长大。实际上，20 世纪有关儿童的心理学研究，如皮亚杰、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荷妮(Karen Horney)、布鲁纳(Jerome Bruner)等或多或少都是基于对弗洛伊德和杜威理念的评价。

一个多世纪以来，儿童已吸引了更为广泛的注意。除了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也一直非常重视对儿童的探索。“儿童”是一个谜，也许就在于它牵涉了人的生理、心理、遗传、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了人们极大的启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心理学家埃瑞克森(Erik Erikson)兼雄心与耐心，跟踪研究了男孩 Gandhi 和女孩 Luther 的童年，但这两个孩子，不过是一种心理状况的承担者，谈不上任何个性；皮亚杰的研究基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注意了大量的儿童生活细节，但他的“儿童模式”仍然只是一种假设。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研究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形式推理”的局限性，这种“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而且，它“否定地对待所认识的内容，善于驳斥和消灭内容”。^② 即使是弗洛伊德，也从未将儿童看成是一个“人”。而历

① [美] 尼尔·波茨曼(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萧昭君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版，第72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史学家，比如阿利斯，尽管他们的工作基于客观考察，帮助我们了解了给定时代、给定地区的儿童生活状况，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从未打算就儿童的性质发表什么见解。至于教育学家，20 世纪最著名的如杜威、蒙特梭利，他们的理念在实践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同样的，五花八门的教育模式可能与真实的儿童相关，也可能毫不相关。

总之，被这些科学话语建构的儿童是本质，是自然，是条件，是分析对象，但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然而不能否认，在揭开神秘的童年之谜，引导人们把童年看成是人的发展的关键时期方面，这些学者功不可没。也正是基于此，儿童开始以新的面貌进入文学家的视野。

三

在西方，19 世纪以来，儿童就已大量地走进了文学世界。且不说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单在小说界，就出现了许多热爱描写儿童、描写童年的作家，如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等）、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爱玛》等）、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20 世纪，有亨利·詹姆斯（《梅西所知道》、《拧螺丝》）、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伍尔夫（《海浪》、《流年》）、卡夫卡（《城堡》）以及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其在 1910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最初的经历》，副标题是“儿童世界的故事”，集中的四篇小说以儿童目光“目睹”了成年人世界的炽烈情欲以及成年人之间的冷酷与淡漠。这部小说集使茨威格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奠定了他的小说家地位。

……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列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家都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他们许多作品的读者也并非儿童。儿童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不一定是主要人物，有些甚至稍纵即逝，但他们在小说中的存在，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儿童问题”也是西方文学研究者持续关注

的话题，各种文章、专著也很多，这儿可以举例的有：Jacqueline Banerjee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的研究 *Through the Northern Gate—Childhood and Growing up in British Fiction 1719-1901* (Peter Lang, 1996); Reinhard Kuhn 从现象学角度，利用互文性理论的研究 *Corruption in Paradise—The Child in Western Literature* (Brown University, 1982); David L. Vanderwerken 从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Faulkner's Literary Childre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Peter Lang, 1997); Alice Byrnes 利用原型理论的研究 *The Child: An Archetypal Symbol in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Peter Lang, 1995) 等。

这些西方作家的作品和相关研究不仅为本书论题的可行性提供了支持，而且也是研究的一个可兹比较的、潜在的“他者”。因为，在中国小说中，儿童同样是小说家挖掘人类经验版图的一部分。

第二节 另一种“儿童文学史”

20 世纪初，乘着西学东渐之风，“儿童观”在中国也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儿童的生命特质有了必要的认识和体验的前提下，儿童也不断地出现在叙事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当然，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在过去一百年的文学流程中，中国小说对儿童的想像经历了由单一形态到多元形态的变迁。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掀起一股儿童个性解放思潮，这一思潮直接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得以诞生，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①而且，不少非儿童文学作家也对儿童感兴趣。但这时，儿童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出现在

参阅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年版。

作品中，还不如说是折射着一种新鲜的、灵动的、有活力的精神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在第一批女性小说家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人的作品中，儿童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这种“童心”精神的承担者。尽管有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尽管在他仅有的二十来篇小说中，已有了几个难以让人忘却的孩子、几段沁润着深长情韵的童年记忆（比如《故土》、《社戏》、《在酒楼上》）但显然作为文化巨匠，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别处。

20世纪30年代以来，沈从文在他的翠翠（《边城》）萧萧（《萧萧》）三三（《三三》）身上寄托了自己关于“人性”的理想这些“小儿女”和张兆和的二小（《费家二小》）李小还（《小还的悲哀》）、海南（《湖畔》）招弟（《招弟和她的马》）等儿童在作品中的主体性大大增强，性格各异，各有各的命运。但对儿童的关注，这时仅仅是小说家创作的个人现象（彭家煌、王统照等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几个儿童）。事实上，沈从文到80年代以后才成为研究热点，而张兆和则几乎不为现代文学史家们所提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童年回忆体小说“热”萧乾的《篱下》萧红的《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骆宾基的《混沌》端木蕻良的《初吻》等这一股热潮的出现与动荡的时代以及作家个人的经历相关。作品中的“我”往往是从残缺的故乡图景走进寂寞的童年世界，在借助片断的回溯中追索自己的个性和精神本原的同时，更真切深切地将现实生活与童年足迹相互映照，在两种孤独的投射中沉浸于一种缥缈宁静的心境。童年的回忆潜藏着成年回忆者对生命激情的召唤，对于这些回忆者，童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过去存在，而是在现实的映照下获得了重生，蒙上了别样的意味。童年在这里，具有了弥合修补的功能：弥合种种经验人生中的痛苦不幸所带来的创伤和疲惫，因为，“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中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

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①。在这些作品中，蕴涵了两种孤独：一种属于童年的“宇宙性孤独”，这是一种安宁平和、抚慰性的孤独；另一种则是“社会性孤独”，由于战火烽飞、时局动荡这样一个时代性他者的闯入而充满焦灼和不安。这些作品关注的是童年之“景”，童年生活的主体——儿童是成年回忆者的生活记忆、精神故乡的象征物。小说叙述重在“事”而不是“人”。

十七年文学尽管出现了“成长小说”的繁盛，《青春之歌》、《红旗谱》……但这个本来最容易使人联想到孩子的“成长”的“成长小说”，却几乎与孩子无关，它所揭示的“成长”是一种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智慧的成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儿童的面影是很模糊的。即使在儿童文学领域，儿童小说要么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要么即使描写儿童的校园生活，也是让儿童被动地处在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被教育者地位上。也许让人难忘的惟有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中的那个机智勇敢又顽皮不逊的少年张嘎，随着同名电影的放映，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即使在今天，仍让许多已长大成人的当年的孩子们唏嘘不已。但是，随着1960年前后文学理论界对“童心论”的批判，小说中已找不到可以让人加以审美的儿童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当代文学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儿童自然也就“销声匿迹”。

噩梦醒来是早晨。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揭露伤痛、反思时代的思潮的开

施勒格尔语，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② 但要指出的是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出版了那部日后在大陆文坛为她带来极大声誉的小说《城南旧事》，小说以女孩林英子的眼睛“观望”30年代北平城南的人情事态。不仅塑造了林英子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其儿童视角和天真叙述人（儿童叙述者）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小说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始，那几个孩子：王晓华、谢惠敏、宋宝琦等也预示着小说中一种新的质素。其后，张洁的《拾麦穗》、《森林里来的孩子》则以更为细腻的笔调赋予儿童与童年诗意的内涵。特别是《拾麦穗》，那个想要长大后嫁给卖灶糖老汉的小女孩、那个歪歪扭扭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甚至冬日阳光下柿子树上的那个孤零零的红得透亮的小火柿子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童年想像。童年引起新时期作家注意的另一个佐证是：翻翻诗人们的诗集，几乎人人都有追忆或描写童年生活的梦幻般的诗：王小妮的《孩子们》、杨炼的《海边的孩子》、梁小斌的《爷爷的手杖》、傅天琳的《我是苹果》……

时光流逝。翻阅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这二十年间的主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小说界》、《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孩子们从不同的“方向”纷至沓来。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及了批评家们加以分门别类的各种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家族小说、新历史小说、先锋小说，还有更多的难以命名的小说。说及这些小说中的儿童和童年，不仅有人们熟悉的《小鲍庄》里的捞渣、《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爸爸爸》中的丙崽、有莫言、苏童、余华、迟子建等评论界颇多关注的小说家，而且还包括了大量其他作家的作品（如范小天、腾锦平、王彪、懿翎等作家的作品）。

这些儿童，无论他们在作品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还是边缘的位置，都或多或少地凝聚着作者（隐含作者）的其他目的：非“儿童本位”的目的。对儿童的描述所造成的叙事影响服务着作者（隐含作者）特殊的目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或是美学的。那些孩子或是被放到成年人的自私、冷漠、残酷或温情、关怀中，比如莫言的《拇指铐》、阿真的《我爱你 孩子》或是在回忆中熠熠生辉以个人的历史折射时代命运与民族的历史，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梁晴的《大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以及苏童的“枫杨树系列”；或是作为一种艺术建构手段，以童眸观照成人纷乱的

生活、反思某种荒诞的时代精神，比如范小天的《儿童乐园》、韩东的《反标》或是一种古老文化的象征 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或者在时光的流转中寄托小说家的某种哲学情思，比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

儿童，成为连接这些题材不同、风格迥异，立意主旨也千差万别的小说作品的逻辑起点。

第三节 小说儿童

“小说儿童”是儿童想像式存在的小说方式，它是叙事虚构的人物。

叙事学家米勒曾经指出，分析叙事作品有九种方式，这九种方式分别关注叙事作品中的九个范畴^①，“人物”是其中之一。

本书所理解的“人物”，既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具有心理纬度的形象（具有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也不像结构主义叙述学那样，把人物看成是“功能性”的，认为人物是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②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叙事学在修正这两种多少有些水火不相容的“人物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的人物观。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中指出，叙事中的人物同时具有三个因素：（1）模仿的因素（作为人的人物），即对现实中可能有的人加以模仿的因素；（2）主题的

这九个范畴是：（1）字母和书本的物质方面；（2）叙事序列或叙述；（3）人物；（4）人际关系；（5）经济状况；（6）地形；（7）插图；（8）比喻性质的语言；（9）摹仿。见米勒的《阿瑞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一书的 19～21 页，也可参看米勒的另一本著作《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1 页。

^②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65 页。费伦的“人物”分析模式实际上是对这两种人物观的融和。

因素（作为主题的人物），即叙事中关注主张、意识形态立场和教导读者真理方面的因素，在本书中，指的是人物的叙事策略方面的因素；(3)综合的因素（作为艺术建构的人物），即在文本更大的建构内，人物作为人工构造的角色，在本书中，指的是小说家书写儿童的方式以及经验儿童在进入小说后所发生的诗学转化。在一个叙事文本中，人物的三个因素有时会同时凸现，有时只凸现一个或两个因素，其他的则以潜在的方式存在。

这种新的人物观，其“模仿性因素”比较好理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物形象”的内涵基本一致；而“主题的因素”是就人物在叙事文本呈现其价值观、主旨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而言的；至于“综合因素”，强调的是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虚构性，是就创作者的主体性而言的，这种因素的凸现通常出现在元小说中，比如马原的小说《虚构》中的人物“马原”就是一个综合人物。不过我们认为，当某一个或某一类人物频繁出现在某一位作家的多部作品中时，其身上多多少少折射着作家建构人物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另外，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已经具有了某些特定内涵的形象，比如父亲、母亲、儿童等，当他们进入小说后，综合因素还指他们所发生的诗学转化。

以这样的人物观打量“小说儿童”，我们发现，1980～2000 这二十年间中国小说对儿童的模仿性塑造，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命题中：“荒诞时代的儿童”、“经历性现实的儿童”、“与成年人同行的儿童”以及“神秘的儿童”。这些命题中的儿童多多少少都是对现实中可能有的儿童的写实。他们往往处于文本的中心位置，不仅仅是小说中成人世界的某种注解，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自足性。这些儿童是叙事情境的经历者，对他们“所历”的关注，就构成了本

书称为“故事”的一章。

本书是在下述意义上使用“故事”一词的：“故事是读者从情节做出的一种建构。”^①因此，上述每一个命题就不一定是小说的全部内容，有些儿童可以跨越好几个命题，比如韩向阳《斑斓的花冠》中的女孩罗丽，既是“荒诞时代的儿童”，又是“经历性现实的儿童”。

在这些并非以儿童文化的本质描述为旨归的小说中，儿童又不完全是为自己存在的：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起着叙事策略的作用，这是小说儿童的“主题因素”，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儿童视角在这二十年间的中国小说中，不仅突出存在而且分布广泛。这一视角所包含的文化原生态质与心理内涵，使之在与年龄化、成人化、性别化等叙述方法相比时，在叙述上造成的张力更具审美性。而且，由于成年作者（隐含作者）的存在，儿童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来小说的“对话性”，这在叙事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时空等层面都有体现，其实质是“成年”与“童年”的对话。

2. 以童年回忆为主的小说大量出现。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把童年作为回忆的主体不同，在这二十年间的小说中，童年往往作为背景，其中的孩子往往并非主角，尽管这一类小说多用第一人称，“我”的个人历史也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时代，用叙述学的语言来讲，40 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是自身故事的叙述，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而这二十年间的童年回忆体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儿童与人物往往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或者即使在一个层面上，也不是叙事的主人公，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王祥夫的《沙棠院旧事》。即使那些童年就是叙事内容的小

^① [美] 爱玛·卡法勒诺斯：《似知未知：叙事里的延宕和压制的认识论效果》，见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 页。

说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童年的“修辞”功能也是很强的。在这些小说中，儿童视角起着一定的时间构形作用。

3. 不少小说中存在具有象征意义和起着某种精神折射作用的儿童。如王安忆《小鲍庄》里的捞渣，迟子建《日落碗窑》中那个诞生在碗窑废墟中的婴孩，莫言《拇指铐》中那个从阿义身上诞生的小小孩，余华《夏季台风》中的星星……但这些儿童的象征、折射作用在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内涵的实质上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小说不同。

这一切，构成了小说儿童的话语性存在。

新的“人物观”从横向的角度观照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把小说人物放在心理和功能的纬度上加以考察，而且也关注小说家对小说人物的反应机制，这是小说人物的综合因素。实际上，我们注意到，不只一个作家在不止一篇小说中关注儿童，这其中有人常常提及的莫言、苏童和有着非常自觉的“童年意识”的迟子建，还有王安忆、余华以及还不太为小说评论界关注的范小天、滕锦平、李佩甫、韩东、王彪、懿翎等小说家。儿童在这些小说家的作品中，成为一个频频出现的“意象群”（这里说的“意象”与前文的“意象化”显然不一样）。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它呈现出相似的“品质”；在不同作家、特别是不同性别的作家作品中，它又呈现出差异性。这种现象，可以看成是文学作品的“同素异质”现象。

在笔者看来，目前研究小说人物的基本模式是：从“史”的角度，通过对某一类人物形象（比如女性形象、父亲形象等）演变的基本轨迹的追溯，来探究其嬗变的文化意义。这种模式，试图揭示的是人物身上的社会历史内涵，而常常会忽略人物本身的人性内涵。这是通过小说来研究人物的思路。这一模式在研究中的普遍性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由长期以来，中国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是从“具体人物的命运是时代生活的折射、历史逻辑的反映”（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这一思路出发造成的。

这些“相似”与“差异”主要体现在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对儿童这个“意象群”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发掘——比如儿童作为“意象群”的依据，这一意象群的意义指涉及意义组织方式，等等。一句话，作为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的儿童在进入小说后，是通过各种转化来获得其诗学的有效性的。这是小说儿童的意象性存在。

小说儿童的故事性存在、话语性存在、意象性存在就是1980～2000年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所包含的三个“域”。

以小说的方式想像儿童，多多少少都会牵涉到作为成年人的创作者个人与他自己身上仍然存在的童年感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书写儿童是一种童年回忆。弗洛伊德曾经说：“个人的童年记忆不只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积累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①也就是说，神话、传说这类历经数代的文化积淀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了他‘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②正是这种相似之处揭示了个人的童年记忆和虚构的童年记忆（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记忆）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有着探究的无限可能。如果我们把小说看成是一种“移位”的“神话”那么小说儿童和经验儿童也有着可以探究的相似性。

本书即是试图通过对这三个“域”的观照，探寻儿童的些许“秘密”，也许能据此更好地理解真实的儿童。但是，打算透过小说文本，去揭示儿童的本质特征，这将注定要落空：当小说为儿童提供了展示自身的舞台时，也给他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试图去捕

〔奥〕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1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